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雅典帝国的覆亡

〔美〕唐纳德·卡根 (Donald Kagan) 著
李隽旻 译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雅典帝国的覆亡

[美] 唐纳德·卡根 (Donald Kagan) 著
李隽旻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帝国的覆亡 / (美)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 李隽旻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5-6685-9

I. ①雅… II. ①唐… ②李… III. ①雅典(古国)—古代史—研究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545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by Donald Kag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7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943 号

雅典帝国的覆亡

著 者 (美)唐纳德·卡根

译 者 李隽旻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685-9/K·488

定 价 12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献给最好的儿子鲍勃与弗雷德

弁 言

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简称《史论》)的最后一卷。《史论》第4卷从413年9月雅典西西里(Sicily)远征的惨败开始落笔,写到404年春天雅典投降为止。修昔底德(Thucydides)没有完成他的战争史述,其《战史》第8卷突兀地终止于411/410年;一般认为,修昔底德没有完成第8卷的写作,也未及对第8卷进行修改。尽管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并不完整,但是,一如《史论》前三卷,修昔底德对战争的记叙与解说仍然是《史论》第4卷的灵感与骨架。《史论》第1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尝试评价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及起源的看法,他的看法主要表达在 Thuc. 1. 23 与 1. 88。《史论》第2卷(《阿奇达慕斯战争》, *The Archidamian War*)详察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Pericles)战略的评估,他的这番评估出现于 Thuc. 2. 65。同时,也是在 Thuc. 2. 65,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进行了评价;在 Thuc. 7. 86,修昔底德评说了尼基阿斯的个人生涯。《史论》第3卷(《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就是处理这两个评价。

修昔底德对战争尾声部分的评价出现在 Thuc. 2. 65. 12—3,他对

2
雅典帝国的覆亡

伯利克里(Pericles)及其政策那番长篇悼词的末尾:

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坚持了10年,^①以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vii, viii-)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供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

这一段文字意味着,即便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新的困难层出不穷,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内部意见不一,雅典原本是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10年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正确看待修昔底德对雅典失败和雅典帝国瓦解所总结的原因。同时,对战争最后10年进行研究,也可以让我们考察并评判雅典民主在最为严峻挑战下的表现。

修昔底德的叙述终止于411年,我们通过直接采用以下几位古代作家的史撰来了解411年之后的战争历程。在这几位古代作家中,只有一位与其所描述的战争同处一个时代;在这几位古代作家中,没有任何一位的天分稍及伟大的修昔底德。研究古典时代的近现代历史学家先判断出最可靠的一篇史撰,全数采信之;对于被断定为不甚可靠的其他信源,则完全无视。无论这种研究方法在一般意义上有何益处,但

① 在修昔底德《战史》抄本中,此处数字是3。关于将这一数字校勘为10的看法,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法文译本,萝蜜莉编译,巴黎,1962年,第101页(Thucydi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II, ed. and trans. J. de Romilly)。戈姆(A. W. Gomme)(《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HCT],第2卷,第196—197页)考察了其他的校勘建议,包括:维持抄本原文不变、训为3年;勘为5;勘为8。戈姆本人倾向于勘为8。考虑本书的写作目的,并无必要在此讨论哪种校勘意见值得肯定。这是因为,修昔底德确实惊叹于雅典人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这一点无人质疑;同时,修昔底德确实认为雅典的失败至少应当部分归咎于内讧,这一点也无人质疑。译注:这一段使用谢德风译本,第151页,除了依据英文原文将数字8改为数字10之外。

是,在研究 411 至 404 年的这段历史时,使用这一方法并不明智。在史撰迄今尚存的古代史家中,只有色诺芬(Xenophon)是这场战争的同时代人,其《希腊志》(*Hellenica*)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连续记载。因此,近现代历史学家一开始就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采信色诺芬的《希腊志》,而不采信内容节略、诸多抄借、成书时间较晚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史述《历史辑丛》(*Bibliotheca Historica*),更不会采信成书时间更晚、同时因致力于德行教导而内容简略、诸多剪裁的普鲁塔克(Plutarch)《平行列传》(*Bioi Paralleloi*)。

1906 年,载有《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chia*)的纸草文献出土,情况彻底改变。我们尽管不知道《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作者是谁,但能够辨识出,这位史家续写了修昔底德史书,内容详尽且行文仔细。巴尔博(G. L. Barber)指出,“这一纸草文献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充分研判动机,作者对小亚细亚地形学了若指掌、具备第一手知识,并提供了在这一时期其他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细节”。^① 有些研究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相对于色诺芬《希腊志》的优点,仅仅表现在海战叙述方面,但是,认为这一纸草文献史撰比色诺芬史撰更好这一看法,(-viii, ix-)早已成为一种趋势。^② 因为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摆明是埃弗鲁斯(Ephorus)史书的信源之一,而埃弗鲁斯又是狄奥多罗斯在叙述这一历史时间段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所以,狄奥多罗斯史书的可信度有所增加,意味着色诺芬史书的可信度有所降低。^③ 然而,这一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就此完全改变先前的研究方法,也不意味着在狄奥多罗斯与色诺芬叙述有出入时我们应当完全采信狄奥多罗斯的说法。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这两个信源既不够完整、也不够可靠,无论对于哪个,我们都不能未经详察便贸然采信。

① 巴尔博,“来自奥克西林库斯的史家”(Oxyrhynchus, The Historian from),《牛津古典学词典》(*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1970 年,第 2 版,第 766 页。

② 此处引文与相关讨论,参见莱赫(P. A. Rahe),“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 407—前 403 年”(*Lysander and the Spartan Settlement 407—403 B. C.*),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 年,第 vi—ix 页。

③ 布鲁斯(I. A. F. Bruce),《〈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注疏》(*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剑桥,1967 年,第 20—22 页。

我们也不能忽视普鲁塔克试图如实叙述事实的努力和贡献。尽管他生活的时代距离战争结束差不多有半个千年,尽管其纷杂著述已有亡佚,但是,普鲁塔克的史撰仍然可以使许多事件的发生脉络明晰通达。普鲁塔克通过公元前5世纪已经亡佚的喜剧诗人泰勒克莱德(Telecleides)、斐林尼库(Phrynichus)、游波利司(Eupolis)、阿奇普斯(Archippus)和普拉图(Plato Comicus)而了解喜剧,通过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菲利斯图(Philistus)和席仑尼库(Hellanicus)及修昔底德的续写者埃弗鲁斯和迢彭浦斯(Theopompus)而通晓历史。普鲁塔克能够读到当时的铭文文献,能够亲眼看见公元前5世纪的许多绘画和雕塑。我们可以通过他自己所叙述的撰史方法来正确判断普鲁塔克作品的价值:“为了避免读者说我疏懒,修昔底德与菲利斯图呈现的这些事件……我还是会粗略带过,但不必要的细节,我也不再赘述。我所试图收集的,是被大部分作家所忽视的那些细节,是其他作家只是随意提及的那些细节,是我在古代的祈愿奉纳(votive offerings)和公开政令中发现的那些细节。我在收集这些细节时,不是在堆砌无用的研究材料,而是为了加强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如颂扬其品格与性情等。”^①普鲁塔克固然有其个人目标,但他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可靠资料。小看普鲁塔克的史撰只会令我们自己的研究受损。

这三位作家——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非常重要,但他们之中并无一人具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当他们的叙述彼此出入的时候,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应当采信谁的叙述。因此,在每一处资料信息有所出入的地方,我们都必须保持开放态度,利用一切证据,做出最佳研判,疏解矛盾之处。在本书中,我将在脚注中说明我愿意采信某一古代信源的理由;但是有时,我的研判只能依靠我对每一情势所能做出的最佳理解。(-ix, x-)因此不可避免,我的一些判断看起来颇为武断,但信源本身的质量决定了基于这些信源的证据的质量,很难再行完善。介绍并采纳任何一种一以贯之的做法都一定会造成错误,所以还不如在每一处类似的地方就事论事。

① Plut. *Nic.* 1. 5, 英文原文基于佩林(B. Perrin)译本。

关于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关于《史论》前三卷,不止一位体贴又有才华的批评家对我热衷使用虚拟语态深感困惑,认为我不该对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个体和群体采取了不同行动的话——进行比较。这种方法被称为“反事实推理/虚构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在我看来,志在写作历史而非编年史的人中,无人能够完全不谈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述这个问题时的直率程度。历史学家与编年史家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历史学家对他们重述的内容进行解释,也就是对之进行研判。历史学家要研判某个举措、某项政策是明智还是愚蠢时,就不得不说——或者暗示——采取其他举措或政策是更好还是更糟,而归根结底,这就是“反事实推理/虚构史”。无疑,我所使用的这个研究方法受到我研究了30年的这位伟大史家的影响。这位了不起的史家不仅常常实践这一方法,使用时也比绝大多数史家要更加直率。有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个例子是,修昔底德在解释希腊人为何围歼特洛伊(Troy)如此之久时说,“但是,如果他们带上了充分的食物供给,以及……如果他们持续坚持战斗,他们可能会很容易在战役中占据上风并夺下城邦”。^①另一个例子是,在总结和评价伯利克里生涯时,说到尾声部分,修昔底德说:“当伯利克里预言雅典也许可以轻易战胜伯罗奔尼撒人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②我认为,如此公开坦率地使用“反事实推理/虚构史”方法,有其重要意义。首先,这令读者清楚地知道,此番陈述是一项判断,一种阐释,而非一事实。其次,这也遏制了既成事实(the fait accompli)所具有的那种言过其实的力量。这令读者明白,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并非某种超人力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这些决定是人类作出来的,而这些事件是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这意味着,所有的决定及其后果都完全可能是

① Thuc. 1. 11. 2. 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抱有偏见,我使用的不是自己的翻译,而是史密斯(C. F. Smith)在娄卜(Loeb)古典丛书中的翻译。相比绝大多数的译本来说,这一译本比较可靠,尽最大可能贴近原文。下划波浪线的这段文字,希腊文原文为: ῥαδίως ἂν μάχη κρατοῦντες εἴλον.

② Thuc. 2. 65. 13; πάνυ ἂν ῥαδίως περιγενέσθαι τὴν πόλιν.

(-x, xi-) 另一番图景。在《史论》第4卷中,我会继续公开坦率地使用这种研判方法。

读者不难发现,我一直从许多学者身上持续获益,无论是仍然在世的学者还是已经去世的学者。在那些已经去世的学者中,我必须再次单独提到聪慧无双的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他为我们奠定了今天的古希腊历史研究;我还必须提到格奥尔格·布索特(Georg Busolt),他的历史研究在知识之完备、分析之细致、研判之公正等方面堪称典范。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向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致敬,在戈姆(A. W. Gomme)与多佛(K. J. Dover)所树立的那个伟大里程碑——《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中,安德鲁斯所写的华丽终章是这一里程碑上拱顶之明珠。同时,罗德斯(P. J. 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ion Politeia*)令人印象深刻,给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从刘易斯(D. M. Lewis)的《斯巴达与波斯》(*Sparta and Persia*)中了解了许多关于波斯的事情。

我对乔治·古尔德(George Goold)、约翰·R·黑尔(John R. Hale)、保罗·A·莱赫(Paul A. Rahe)以及巴里·S·施特劳斯(Barry S. Strauss)表示感激,他们对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了批评。我还要感谢支持我做研究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唐纳德·卡根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目 录

弁 言	1
第一章 西西里惨败之后	1
第二章 爱琴海战事	26
第三章 雅典回击	55
第四章 斯巴达之妙应	76
第五章 革命运动	119
第六章 政变	146
第七章 四百人议事会掌权	177
第八章 五千人政权建立	208
第九章 海勒斯滂战事	235
第十章 民主政权重光	275
第十一章 阿尔喀比亚德归来	305
第十二章 小居鲁士、莱山德与阿尔喀比亚德失势	326
第十三章 阿吉努赛战役	363
第十四章 审判阿吉努赛诸将	395
第十五章 雅典陷落	420

第十六章 结语	460
参考文献	474
译者跋语	480
附录 1 希腊词汇翻译及简要说明	480
附录 2.1 古代文献引述格式举例	535
附录 2.2 近现代古典学家所编古代文献辑丛 引述格式举例	542
附录 2.3 古代文献引述索引	544
附录 3.1 近现代古典学文献引述	551
附录 3.2 古典学期刊刊名缩写与译名对照表	563
附录 3.3 现当代古典学文献引述索引	565

第一章 西西里惨败之后

雅典对西西里的袭击,开始于巨大的胜望,结束于彻底的失败。尼基阿斯(Nicias)是在 413 年 9 月中旬投降并将他那可怜的残兵余部交给叙拉古人(Syracusians)的,所以,败北消息到达雅典的时间不可能比 9 月底早太多。^① 在一则古代掌故中,这消息最早来自于一个外邦人。这人走进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的一家理发店,以为雅典人已经知晓惨祸,于是谈论起这惨祸的细节来。店里的理发师带着这一消息奔向雅典城,但是城里没有人相信他。人们认为这个理发师胡编乱造,尽惹麻烦,把他放上了拉肢刑架,此时,远征的亲历者现身,证实了这个坏消息。^② 我们不必完全采信这则掌故,但是,在这类掌故所描述的图景中,雅典人不愿相信之情却肯定不假。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设法从西西里逃回来的士兵亲自开口,讲述战果如何悲惨,在很长一

① 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见布索特(Busolt),《希腊历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 GG),第3卷,第2册,第684页。

② Plut. *Nic.* 30; 阿特奈乌斯(Athenaeus 9. 407)讲述了喜剧诗人席格蒙(Hegemon)的故事,因为席格蒙的剧作让雅典人十分开心,所以哪怕是在西西里惨祸消息传到剧院时,他们也还是在笑。“没人离开剧场,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一些亲属。所以,他们偷偷地流泪,也不会站起来离开,这样,他们因这一灾祸而来的悲恸就不会被其他城邦来的观众看到。”

段时间内,也还是没有人相信他们。^①

最终已经没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雅典人开始愤怒,尔后恐惧。首先,雅典人猛烈抨击提出西西里远征和为西西里远征辩护的那些政治家们(修昔底德尖锐地评道:“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投票赞成远征似的”)。(1,2-)然后,雅典人对那些预言胜利的预言家们也极为愤怒。接着,雅典人为那些在西西里死去的人而悲恸。最后,雅典人计算着自己的损失和敌人的得益,对自身安全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在西西里得到了新盟友的伯罗奔尼撒人,会带着雅典原先的盟友——到了这时,雅典盟友一定悉数叛变——从比雷埃夫斯港长驱直入,从海上和陆上同时攻打雅典。^②

因为此刻惊慌过度,雅典人对敌军进行有效行动的能力未免夸大,但是,他们忧心雅典的现状,忧心雅典继续战争的能力,是有道理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力。^③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有 13000 名由服役年龄公民担任的重装步兵(*hoplites*),还有另外 16000 名重装步兵承担驻防任务。在这 16000 名驻防军士兵中,有 8000 人年纪不适于服役,其余 8000 人则是外邦居留民(*metics*)。雅典曾经拥有 1200 名骑兵,1600 名弓箭手;能够作为划桨手和水兵服役的日佣级公民(*thetes*)人数在 20000 至 25000 左右。^④ 因瘟疫而致死的人口数目大约三分之一,此外还有部分人口因瘟疫而致弱致残。^⑤ 到西西里惨败为止,雅典

① Thuc. 8. 1. 1.

② Thuc. 8. 1. 2.

③ 我接下来对人力和人口的讨论得益于巴里·S·施特劳斯(Barry S. Strauss)在其“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 404—前 386 年”(Division and Conquest: Athens, 403—386 B. C., 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第二章中的精彩分析。其他有所帮助的解读来自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 3 卷,第 2 册,第 1400 页及注释 5),梅耶(Meyer)(《古代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alter Geschichte, /Forsch.],第 2 卷,第 149—195 页),戈姆(A. W. Gomme)(《公元前 5 和前 4 世纪雅典的人口》[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 C.],芝加哥,1967 年),贝洛赫(K. J. Beloch)(《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口》[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莱比锡,1885 年),以及琼斯(A. H. M. Jones)(《雅典的民主》[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69 年,第 161—180 页)。

④ Thuc. 2. 13. 8;关于外邦居留民和日佣级公民的人数,参见施特劳斯,“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 404—前 386 年”。

⑤ Thuc. 3. 87. 3; Thuc. 2. 49. 7—8;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 71 页。

肯定还没有从这样的人员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西西里，至少有 3000 名重装步兵、9000 名日佣级公民士兵、以及数以千计的外邦居留民士兵阵亡。^① 考虑到从 431 至 413 年秋天还有其他伤亡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到 413 年，雅典重装步兵阶级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已经减至不超过 9000，日佣级公民士兵不超过 11000，外邦居留民士兵不超过 3000——能够打仗的男性人数减少到这样的地步，是令人震惊的。^②

在西西里损毁的三列桨战舰(*triremes*)至少有 216 艘，其中 160 艘是雅典舰船。同时，还有不到 100 艘三列桨战舰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些船舰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失修。^③ 从现有的日佣级公民中寻找船员的任务迫在眉睫，(-2, 3-) 哪怕这些新船员可能既不熟练又无经验。另一个问题或许与此同样严峻，那就是缺乏金钱来修复舰船、建造新舰、支付薪饷。修昔底德叙述到雅典人“在金库中看不到钱”很可能是修辞上的夸张。^④ 但是，到了 413 年，在 431 年时公共金库中能够动用的大约 5000 塔伦特(*talent*) (不包括极端紧急情况的预备资金 1000 塔伦特，防止“敌军以一支舰队来攻打城邦”^⑤) 中，剩下的肯定不超过 500 塔伦特。^⑥ 雅典人也无法指望通过增加帝国收入来补充资金。西西里惨败很可能引起盟友叛变，继而减少贡赋收入，这还不算远征平定起义所要增加的花费。

同时，雅典的内部经济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位于德西利亚(*Decelea*) 的斯巴达要塞从财政、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大地削弱了雅典。他们损失了 20000 多名奴隶，无法开采他们的银矿，不再能够完全自由地支

① 这是布索特(《希腊历史》，第 3 卷，第 2 册，第 1400 页)的分析，看起来比较合理。

② 这些数字是根据上面已经给出的数据和施特劳斯在“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 404—前 386 年”(第 72—91 页)中的论证而估算出来的。

③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 3 卷，第 2 册，第 1400—1401 页；第 1401 页，注释 1。

④ Thuc. 8. 1. 2.

⑤ Thuc. 2. 24. 1.

⑥ 《雅典贡赋表》(*ATL, Athenian Tribute Lists*, 第 3 卷，第 358 页)的作者们说：“很明显，在 414 年，雅典娜金库(*the treasury of Athena*)及献给其他神明的金库中的储备资金又一次被削减到 422 年的低水平。”《雅典贡赋表》的作者估算 422 年的数字是 444 塔伦特(第 3 卷，第 344 页，注释 94)。

配和使用自己的田地，他们在乡间的房屋、还有那些没法搬去优卑亚(Euboea)保存起来的家畜和驮兽也被彼欧提亚人(Boeotians)劫掠、偷盗。他们进口必需货品不得不绕远路，价格因此上涨；同时，他们还必须养着那支日以继夜守卫长墙的武装力量。^①更多的公民被剥夺了生计，被迫涌入城市。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进口费用增加，物价也相应上升。国家不得不养育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公共财政雪上加霜。^②

战争的灾祸同样给有财产的阶级带来苦难。这些人被迫丢荒曾经为他们带来收入的农地，他们的房屋被彼欧提亚人大肆劫掠、任意摧残。有证据表明，有产阶级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y)是由比较富裕的雅典人轮流承担的一项公共职务。(—3,4—)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不仅要指挥一艘战舰，还要为其提供补给，甚至亲自给船上的划桨手支付薪饷。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一般是一名舰长指挥一艘三列桨战舰。但是，在惨败后不久，出现了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syntrierarchy，共同指挥三列桨战舰)这样的职位，这样，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费用可以由二人一起承担。^③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甚或早至413年，戏剧演出的歌剧队的祷告中就出现了类似的联合职务，分担职责。^④在这个国家里，有足够财富来承担基本军事义务和宗教服务的人显然已经不够了，所以，不能指望推行直接战争税(eisphora)能够改善当下的情况。我们能够确定的直接战争税只征收了一次——在428

① Thuc. 7. 27. 3—28. 2；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第291—292页。

② 对此刻雅典经济困境的最佳讨论，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4—1408页。

③ 关于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职责与花费，参见 Thuc. 6. 31. 3；Lysias 32. 24；阿密特(M. Amit)，《雅典与海洋》(*Athens and the Sea*)，布鲁塞尔，1965，第103—115页；以及莫里森(J. S. Morrison)与威廉姆斯(R. T. Williams)，《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Greek Oared Ships, 900—332 B. C.*)，剑桥，1968年，第260—263页。关于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出现的日期，参见约尔丹(B. Jordan)，《古典时代雅典海军》(*The Athenian Nav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伯克利，1975年，第70—72页。

④ 对阿里斯托芬《蛙》的一则注疏：Scholion to Aristoph., *Frogs* 404；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5页，注释1。